



不记得小学几年级开始，书包里放过一种黑橡胶制成的砚台和一锭学生墨，上写字课时拿出齐刷刷地磨，沾满墨污的手拿着几分钱一支的毛笔，按照描红簿上的颜体字，一个一个地描，这也算是书法的启蒙教育吧，后来写字课作业改写钢笔了，不知不觉把毛笔砚台都丢弃了。

再次拾起毛笔则是近十年的光景，对我而言，用毛笔写字好像是介于痛苦与快乐之间的一种游戏了，痛苦的是每次提起毛笔犹如

平生就欣赏喜爱铁画轩的作品，有机会就收藏几件，尤喜其文房类的器物。此类作品大都精致脱俗，意趣盎然。这件段泥圆形格碟作品就是在宁波古玩市场淘来的（见图）。此格碟泥料纯正，器型规正端庄，大小合宜，盈手可握，别致可爱，其直径 12cm，内径 10cm，圈足直径 8cm，高 3.5cm。圆碟中间一分为二，隔断为八卦阴阳形；外壁肩部镌刻着“晴成破壁灵飞去”七个草体大字，落款为“时在乙丑，玉道人并刻”，内壁为二次入窑低温烧制的开片白釉；碟底钤有方形篆体阳文印章“铁画轩”。显然这是一件戴国宝作于 1925 年的晚期力作，迄今也有 90 年的历史了。

紫砂格碟器的形状呈多样性，笔者就收藏有四方形、长方形、椭圆形、花形、扇形、几何图形等，器物中间都有 2 至 4 个左右的隔断。格碟一般用途为书画家用于创作时的涮笔、蘸水或调色。刻词“晴成破壁灵飞去”源于“画龙点睛”的故事，说的是南朝梁代大画家张僧繇特擅画龙，梁武帝请其在金陵安乐寺的墙上画龙，他画了四条栩栩如生、惟妙惟肖的龙，但都没点眼睛。众人不解，怂恿他点上龙眼，他刚

张大千的定制笔

◆ 王金声

千钧，手指全然不听使唤，写出的字个个死蛇僵蚓，虽已购置过法书名帖盘桓了数年，依然不成字。事实上精于书法者，半由功力、半由天分，既然自己天分不足，那玩玩写字的毛笔总行吧。

苏子美尝言：明窗净几，笔砚纸墨皆极精良，亦自是人生一乐。这种乐事想必也是我的追求之一。书法本来就不是尽人能精，也不一定要人人都会写毛笔，毛笔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，我反倒更加钟爱起名家制作或名人订制的毛笔。

前人重笔因为它是传统书写工具，历来榜居文房之首，今人爱笔则出于赏毫兼赏管，明清遗留的旧笔遂成了收藏的古玩。

前日大雪，窝在了书房，望着案头琳琅的文玩，竟也心绪宁静愁意尽消，但凡有了名砚名纸和名墨，名笔是断不可少的，眼下数十款是我近年收集的李福寿、老周虎臣、李鼎和等民国笔庄和名匠徐葆三制作的佳笔，也有沈尹默、黄宾虹、冯超然等书画大家用过的毛

笔，材质有竹木、牙管犀皮漆等。当中最有名的还数一支张大千用的“大风堂选毫”，说起这支笔也颇有来历，首先是张学良的遗物之一，得之于去年北京一家拍卖公司中的“定远斋”专场，成交价也超出一张“沪牌”的价格，而且是国画大师张大千自己定制的专用笔。大千先生在制笔用料方面十分讲究，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，他早年曾在国内一些知名笔庄定制画笔，中年后游历海外，主要在日本的“玉川堂”、“喜屋”和“高诚堂”几家定制毛笔，他最钟爱的还是“玉川堂”所制“山马笔”，它的笔毫采取的是生长在日本东北岩手、长野、九州岛山马的尾毛，其生长期横跨四季而极富弹力，因量少限产故特别的珍贵，大千即以“大风堂选毫”为名，专门定制从特大号至四号一批精良的长锋山马笔，并用此笔题了“锐齐健圆”、“得心应手”两块匾额赠与“玉川堂”，无疑给了“玉川堂”以最高褒奖，大千有时也拿此笔作为伴

民间收藏 / 国家艺术杂志

新民晚报

手礼馈赠台湾政要，张学良的那支毛笔想必就是大千所赠。

那时艺坛还广为传颂一段毛笔情缘的趣闻轶事，1964 年张大千旅居巴西期间，曾委托朋友在英国某郡牧场从上千头黄牛的耳内采集到的一磅绒毛，带到东京的“玉川堂”、“高诚堂”和“喜屋”三家笔庄制成 50 支“牛毫笔”，命名为“艺坛主盟”，并赋诗一首：“雄狮百胜恣横行，执耳升坛众与盟。所向从来无劲敌，敢从纸上笑书生。”大千先生将这批笔除自用外，还寄赠包括毕加索在内的画坛故交谢稚柳等人，而赠给谢老的那对笔，竟辗转十年后方才到谢手，谢专为此赋诗：“十年风腕雾双眸，万里思牵到雀头。英气何堪摇五岳，墨痕无奈舞长矛。蛩笺放浪霞成绮，故服飘飘海狎鸥。休问巴山池上雨，白头去日苦芳遒。”两支毛笔心系着两人的半世情义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
大千先生往往对自己秃废的毛笔采取集中埋葬处置的方法，在旅居巴西的“八德园”、美国的“环庵庵”两处园林中均筑有“笔冢”，取东坡“笔成家，墨成池”之意，葬笔千支，经常踱步于“笔冢”前沉思，其对笔之敬、之爱、之痴可见一斑。

批宣兴著名紫砂艺术家和陶刻师为之创制名作，如范大生、程寿珍、俞国良、吴云根、陈光明、李宝珍、胡耀庭、强义海、王寅春、顾炳荣（顾景舟之父）、潘柏寿、陈少亭、邵宏俊、饶寿川、谈泉明等。所以，各类紫砂作品上也常常署其所聘的名家高手的姓名。由于他熟谙市场营销，目标市场定位于海内外中高档客户，其销售的各类紫砂壶、瓶、鼎、尊、炉、筒、洗、罐、钵、孟、盘、碟、盆等作品大都符合时代欣赏要求，迎合满足了文人达贵的审美情趣，作品追求器形精雅多变，古朴典雅，镌刻的书法和图案也极富文人氣息，所以铁画轩出品皆为市场佳品，广受海内外紫砂爱好者的追捧。

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戴国宝是 20 世纪中叶前中国一名既熟谙艺术品经营管理，又懂得紫砂艺术属性、且能自制自画自镌紫砂器的不可多得的“老板艺术家”。正是有了像他这样一批有胆有识、多才多艺的老板及商号（如吴德盛、陈鼎和、葛德和、艺古斋、毛顺兴等）的苦心经营、竭力推广，才使得中国紫砂传统艺术之光得以代代相传，发扬光大。历史应当牢牢记住他们。

别致的紫砂格碟

◆ 蔡一宁



点了两条龙的眼睛，顿时电闪雷鸣，两条龙便破壁腾空飞去。此典故后常被用来比喻写文章或讲话时，在关键处用几句简明扼要的话点明实质，使内容更加生动传神。试想一只刻有典故、箴言、警句的格碟，放在书桌案头，其对于书画家构思、创作的影响，不啻为涮笔、蘸水和调色的功用，还隐含有座右铭式的励志、审美、寄托、启智、警醒等效能。

戴国宝，字玉屏（1875—1926），著名紫砂商号“铁画轩”的

创办人、紫砂陶艺人。他本是刻瓷名手，能书善画，擅长治印，与吴石仙齐名，以双钩法用钢刀在瓷上刻绘，名扬江南。民国初年他在上海创办了蜚声中外的“铁画轩陶器号”（该店现已迁至上海豫园），专营宣兴紫砂陶器名品。“铁画轩”的作品一般署名戴国宝本人的印记（印章或刻款），如“戴氏”、“铁画轩”、“玉屏”、“玉屏主人”、“玉道人”、“访雪”等。同时，戴老板不仅自己艺术品位颇高，而且还慧眼识才，知人善任，曾先后聘用了一大

57 年前的《上海民歌选》

◆ 马蒋荣

日前，我参加了由作家金志远老师组织的原工作单位在化工局的文友笔会，坐在我旁边的老者竟是王森老师！他是我儿时一直学习背诵的一首“戴花要戴大红花，骑马要骑千里马，唱歌要唱跃进歌，听话要听党的话”诗歌的作者！

交流中我知道王森老师虽然已年届耄耋，但一直笔耕不辍，经常有诗歌见诸媒体。最近还应有关出版单位的邀请，在参与编写一本有关上海民歌的史学书。突然，我想起自己收藏的《1959·上海民歌选》精装本书，那是我老妈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中读扫盲班时花 1.2 元钱买来课外阅读的。记得这是我家当时唯一一本除教科书以外的书籍。于是我立即告诉了王森老师，王森老师一听非常感兴趣，

他正在四处找寻该书作资料呢，于是我俩当即约定了送书的时间。

这本精装书仅发行了 5000 册，共收录了 114 首由当时老百姓自己创作的民歌和蔡振华、董天野、张乐平、沈柔坚等著名画家的整版彩色配图 15 幅，除序歌外，有颂歌、工人歌谣、农民歌谣、战士歌谣、其他方面歌谣、革命传统歌谣等六辑。其中每一首歌谣都有着那个特殊年代火一样的热情、水一样的柔情、海一样的深情。

不过，关于这本书还有一个曾经让我心惊肉跳的故事：

四十多年前的一个下午，工厂大礼堂里正召开批斗大会，台上几个斗批对象低着头轮番接受造反派们的批判与声讨。我和与会职工一样，只能是老老实实正襟危坐，

接受着“教育”。突然，两位厂武保组的人神秘兮兮地钻到了我面前，说让我马上出去一次。

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大礼堂的。当好不容易跟着那两个人来到了厂门口的传达室，只见厂武保组的负责人正坐在里面，一脸严肃地看着我：“这是寄给你的吗？”我顺着他的声音看到了他手上拿着一包用旧牛皮纸封好的邮件，也看到了上面清晰地写着“马蒋荣收”几个字。噢，我立即看出那是我参军弟弟的笔迹。不知道弟弟寄给我的是什么东西？当我走近一步想从这位负责人手中取回我的邮件时，他条件反射似的把手缩了回去，并且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：“这是些什么书？你要老实讲！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啊。”接着他又说：



“那么你当着我的面拆开！”我只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，撕开了包装纸，谢天谢地！原来是弟弟在春节探亲时拿走的一本 50 年代初出版的《山水素描》和这本《1959·上海民歌选》，因我弟弟他们的部队调防，所以寄回给了我。



作为著名花鸟画家钱行健先生的入室弟子，印良的工笔画基础可谓是稳扎稳打、技法精到。

早在 1984 年，印良就以一幅工笔花鸟《报新春》获得“江南之春”画展二等奖。也正是这幅作品，受到钱行健先生的格外赏识，将印良收入自己门下。在钱老的指点下，印良的绘画功力迅速提高，突飞猛进。某次，钱老看了印良的作业后，非常高兴，赠予印良一幅自己的画作（见图），叮嘱他要多临摹古人作品，把画画当作终生事业来认真对待，不要埋怨没有机会，是金子总会发光。

良好的绘画基础，加上钱老后天的精心调教，使得印良笔下的花鸟，突破传统工笔花鸟画一味单纯追求细腻的手法，形成他自己独有的风格。该细腻的地方，他用一根根线条交待清楚；该蓬松的地方，他用写意手法挥洒自如。工笔里面兼有写意，这种形神兼备的创作手法，让一花一鸟透出灵秀之气，宛如优美小诗。

在学艺的过程中，印良收获的并不仅仅是绘画技巧和风格，钱老身上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深深鼓舞着印良，使他在对新海派花鸟语言的探索 and 追求上培养出一种孜孜不倦、积极向上的态度。中国花鸟画历经各朝名家的创新发展到今天，无论是笔墨技巧，还是构图意境，都已被赋予崭新的时代风貌。钱老告诉印良，中国的花鸟画不要简单理解为只画一朵花、两只鸟，它应该承载着画家对生活、对世界的理解。

钱老的艺术观、美学观直接奠定了印良的创作理念，那就是艺术要为人们带来美好和快乐，滋养人的灵魂。印良笔下的花鸟，是喜气的，也是吉祥的。卖画四十载，印良所接到的订单源源不断如雪片飞来，其中道理很简单，人们喜欢看到喜气和吉祥的花鸟。市场需要雅俗共赏的艺术。

如今的印良基本上每天都要作画至深夜。夜深人静之际，劳作于灯光与黎明之间，一笔一笔描绘着那个属于他自己艺术生命中的“自然世界”。明哲而又痴心。

正如所有职业画家一样，印良回忆自己走过的艰辛，更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成绩。印良动容地说道：“人品和画品是挂钩的。人品的高度决定着画品的高度。我的艺术人生理念也恰恰正是钱行健先生对我的当年教诲，画好画，做好人”。

这是一个画家跨越了艰辛后所获得的巨大自信 and 自由。

画好画，做好人

◆ 胡海萌